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近日已经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力图对 30 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进行扫描和观察,并不尝试对 30 年文化进行全景式的描述,而是期望通过对许多“点”的深度的观察和思考让读者对于 30 年来中国的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人们回首 3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开始总结过去 30 年所留下的弥足珍贵的记忆和历史的经验。而此时,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正是在这样新的条件下,回首往事才显得格外重要,回顾历史才显得富有新的意蕴。

历史的启示在今天新的情况之下显得弥足珍贵,30 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财富正是我们应对当下挑战的条件和基础,而 30 年发展解放的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是今天面对未来的资源和条件。正是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所走过的道路的不易。也正是由于今天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当年的果敢和明智才更值得记取。

正是 30 年前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有了今天的实力和条件。正是由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才让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年

努力书写一个大时代的精神变化——写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出版之时

张颐武



我们可以发现,30 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给中国人自己更多的文化自信;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新的中国形象。正像我们在书中所概括的:“中国 30 年来改革开放的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正是为今天创造了历史的机会。正是中国人在 20 世纪的奋斗和这 30 年的发展为今天提供了条件,而新的全球化进程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这 30 年中国人为了告别贫困艰辛地劳作,为了

改变命运而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我们的辛苦和努力在今天结出了丰美的果实。我们在自身走向繁荣,改变贫困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形象,也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些岁月其实是格外弥足珍贵的。我们可能处身其中,难以感受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具有的巨大的意义,也难以充分体验我们的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我们的努力的意义会被历史所铭记。中国的大历史正在展开自己新的形态,中国也已经走出了悲情。我们不需要说今天的中国是‘盛世’,因为我们会意识到前面的挑战和问题。也因为我们的未来会更加辉煌,我们不需要说今天的我们创造了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矛盾和困难的选择在考验我们,也因为我们知道前方的道路其实更加宽广。30 年来的中国其实说明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离不开中国。让中国和世界一起前进,让人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本书力图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发展中文化的变迁。它是多人合作的成果,分为“正编”和“副编”两部分。“正编”的部分力图让读者对于 30 年文化的一些重要发展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一部分也不求门类齐全,而是追求对于历史线索和发展脉络的把握。“副编”则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个案来进行研究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书给 30 年的文化画出一幅速写式的,但却充满着独立分析和独特视角的图像。

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希望以这部并不完备的小书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创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

傅雷译著手稿全部捐赠国家图书馆

本报记者 张 贺

近日,傅雷现存译著手稿全部共 29 种,计 27 册又 1698 叶捐赠给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捐赠,并向傅雷次子傅敏先生颁发了国家图书馆收藏荣誉证书。

傅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和教育家。他是 20 世纪中国翻译界的典型代表,他用文学翻译活动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傅雷以勤奋的一生,翻译了 34 部外国文艺名著,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留给世人的 500 多万字的译著是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此次捐赠的手稿包括所有现存傅雷译著手稿,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幻灭》、《艺术哲学》等,另外还有傅雷的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共 29 种,计 27 册又 1698 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包含 1961 年傅雷为傅聪抄写的《希腊的雕塑》。傅聪曾说:“他(父亲)的内心生活可不得了,如海洋一般汹涌澎湃,热情洋溢!从他给我抄写



部译稿大都保留了初译稿、二稿和定稿,其中每一遍都是傅雷先生亲自誊清,甚至在最后发排的时候,还在不停修改。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近傅雷,从 12 月 12 日起,“傅雷捐赠译著手稿展”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珍品展室开展。很多作品都将对比展出初稿、定稿。其中《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是傅雷现存手稿最完整的,有初译稿、二稿、定稿,这三种手稿本的对比展现了他一生对完美的执着追求。大部分手稿是傅雷先生用毛笔小楷誊正的,堪称书法艺术珍品。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出版

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章太炎先生诞辰 140 周年纪念会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发布会”近日在京举办。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1908 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解字》、《尔雅》、《庄子》等。7 月又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单独开设一班,讲授《说文解字》。这批学生日后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主将,或成为弘扬国学的知名学者,其中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人的课堂笔记保留至今。20 世纪 80 年代末,章太炎的后代委托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教授整理这批笔记,陆教授逝世以后,他的弟子王宁教授继续承担这一工作。《说文解字》笔记内容艰深、字迹潦草,整理与出版工作持续了 10 年,2008 年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距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整整 100 年。

情感教育谈教育审美

推动素质教育模式建构的《情感教育论纲》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作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文主义立场和历史辩证的方法论,融入本人多年积累的教育实践与人生感悟,将哲学的思、科学求证的用心和旨在改善实践的情怀,严整、自然而优雅地表达出来,使作品所创造的一系列新颖思想、所揭示的一个个教育机理具有很强的理性和审美魅力。

沥血写群英 奇迹入青史

李根明

他有着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杨迪的三部回忆录从写作到修订再版,历经 9 年时间,经历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由于他年岁日高,战争年代负过伤,疾病时时困扰着写作,他做过三次口腔癌手术和一次心脏手术。病情稍有好转,就用颤抖的手坚持写作。当医生和家人劝他休息时,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写下去,才永远不留遗憾,如果再停笔,恐怕就写不完了,这样会愧对历史、愧对先烈、愧对后人的。”

在写作中,他有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杨迪同志办任何事情都极为认真,写作也不例外。他写作时,字斟句酌,力争叙述的真实性和文字的准确性。每当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图表中的一个标注也不放过。在写作和修订再版中,他认真征求和听取多方意见与建议,增写和修改了部分内容,使著作得到进一步完善,体现了他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今天经过修订再版、飘香墨香的书,凝结着杨迪的辛勤汗水和心血。这是三部浓缩的军史、英雄的史诗、奉献的赞歌、难得的教材。

“我们这代人给下一代什么东西,我们未来的共和国就是什么颜色。”这是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家、女诗人柯岩曾经在《小读者》改版初期对主编杨宗、李荣胜的嘱托。从此,“办一份干干净净的少年杂志”,成了杨宗及《小读者》全体同仁的不懈追求。

改版伊始,由于定位不准、信息量不够、发行途径有问题,《小读者》全国邮发只有 143 份。为了走出困境,他们买来 70 多种期刊仔细分析,得出少儿读物市场“三分天下”的认识:一是教材的延伸读本,如课外辅导、教学参考,甚至精确到哪一堂课讲了什么内容,徒增孩子负担;二是以赚钱赢利为目的的读物,搞星座占卜、谈情说爱,打擦边球,会给孩子心灵涂抹上不正常色彩;三是真正适合孩子、能够促进少儿全面发展的社科类读物。这,正是他们想做的。

于是,三个目标确立了:让社会认可,让家长老师满意,让孩子喜欢的好读物。实现这 3 句话,他们用了 3 年时间。3 年里,主编

本报记者 李 鹤

杨宗、李荣胜一次次把《小读者》拿给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阅读,要求挑刺找毛病,直到获得首肯。他们又跑到北京景山学校等做调研,请老师们传授如何与孩子对话之道,确定了小文章大道理、小故事大境界的形式,从而一点点褪去之前身上浓浓的说教味。

怎么让孩子喜欢呢?杨宗索性在家里开起了茶话会,把孩子们请到家来读书、聊天,说说他们喜欢什么。如果孩子们不喜欢,老师家长满意也没用。为此,编辑们煞费苦心,从色彩、插图、版式、包装都要想很多办法,从内容上与孩子互动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 年底,《小读者》发行量跃至 15 万册,月均增长率在 40%以上。

《小读者》坚持每信必复,这是《小读者》

的内部规定。每个月有上千封的来信,5 年多下来就是六七万封,光信封、邮资的成本就超过 10 万元。编辑部有两名编辑专职负责给孩子回信,有的孩子最多收到了 27 封回信。编辑们用一颗“妈妈的心”来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来信。有孩子写信表示自己接到《小读者》来信的激动,“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快乐心情比飞上了蓝天还开心。”

为了促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从 2005 年起,《小读者》每期还免费向家长们赠送《家长刊授读本》,为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出谋划策,成为家长、老师的得力助手。

这还不够。影响未成年人,就是影响社会的未来。我国目前有近 3.8 亿未成年人,为

《中国大使手札》出版发行

由华侨传媒、上海侨报社、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联合策划推出的系列外交读物《中国大使手札》系列丛书(8 本)于近期出版发行。

该丛书不仅展示了老一辈外交官们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故事,同时,许多回忆也具有钩沉史料的价值。此外,华侨传媒和上海侨报社还将向外交学院无偿捐赠 100 套该丛书,作为图书收藏和研究之用。(刘 阳)

《大跨越》记录电信业 30 年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电信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景式记录这一辉煌发展历程的《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一书。全书以记人记事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电信业 30 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一事一章,内容丰富。

他们提供健康的阅读和成长氛围,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组织和动员全国知名人士关心小读者,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爱,编辑部不断开动脑筋。从 2003 年起开始,编辑部全力争取并陆续建立了一支由 30 余名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队,这些仁智之士成为《小读者》发展强有力的支持者。此外,他们还邀请著名作家点评小读者的习作,帮助小读者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鼓励孩子的创作热情。目前已有王蒙、邓友梅、从维熙、郑伯安、刘恒、王安忆、张抗抗、高洪波、郑渊洁等 50 余位作家与小读者们进行了交流。

杨宗说,培养更多“健康、善良的生命,活泼、智慧的头脑,丰富、高贵的灵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给小读者,将是《小读者》始终如一 的追求。

回顾中外历史,但凡文化出现高度发展与繁荣,必也是大编辑辈出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文化,与其说是开风气之先者,毋宁说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与西方文化的开创者。孔子,删《诗经》、作《春秋》,序《周易》,同样也是当时传统文化的最大的总结者、传承者与开创者,尽管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些大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大编辑。

大编辑总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促进者。所谓大编辑者,是有别于普通编辑、高级编辑的。普通编辑,可以校文字之对错、查语句之是非,顺逻辑之关联。高一个层级的编辑,在文字上超越了仅仅纠错的范围,上升到文字之妙用,如古人所称“一字师”。当年臧克家先生改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原驰腊象”将“蜡”改成“腊”,深得嘉许。高级编辑不止于在文字之妙用,其对篇章之结构、气韵,应当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达到能从文品观人品的境界。

而所谓大编辑,则是开宗风,导风潮,育才俊,还要“自开风气不为师”。他一定是站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的高度,对时代精神的培育、时代价值的构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五四”以来,如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办《新青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以及后来的邹韬奋、王云五等,对于新文化之甄别引进、国故文化之批判传承,功莫大焉。

我以为,大编辑的产生在目前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大编辑的产生需要大时代的契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大编辑的良好机遇。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与手握文化权力的编辑也是大相攸交的。在改革开放 30 年、建国近 60 年中,涌现出了像黄涛这样的优秀编辑代表。在新的历史契机上,需要编辑继往开来,催生和培育更多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任何时代的辉煌,最终都会体现到文化价值的衡量上,文化成功是一个时代价值的最高体现。而大编辑对于文化的生产,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当年,鲁迅的文章经翟秋白编辑后,遂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佳话。所以对一个文化工作者而言,应当抓住这个时代的契机,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建构者。

其次,大编辑的成就需要大事素材。很多伟大的作品与大事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大事的出现,既考验我们的民族智慧,也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向、价值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 2008 年为例,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编辑的大事素材很多。年初 50 年未遇的大冰雪灾害,在广大军民同心协力下,保证了全国人民在冰雪中过一个温暖年、平安年。这一笔精神财富还未及深入总结,又发生了“藏独”冲击奥运火炬传递。西藏历史被严重歪曲,历史真相亟须澄清,也使我们对自己的国际形象定位有所观照。紧接着的汶川大地震,更是涌现出了无数的感人事迹,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大灾之后,奥运会成功举办了,这大大地振奋了民族的士气。百年中国,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如此的聚焦与赞誉。而随之而来的三鹿奶粉事件,又引起我们关于企业责任的思考与追问。年底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共度时艰的自信心。这一系列的大事处理与应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财富,也是编辑的最好素材。

最后,民族复兴呼唤大编辑为民族价值观科学建构作出贡献。古言多难兴邦,是指一个民族历经磨难,坚强不屈,从而愈挫愈奋,凝聚成一股伟大的力量来促进民族的复兴。如果说大灾害的发生是一聚最生动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人道主义的素材的话,那么编辑,则是要通过自己的双手与智慧把这些素材转换成不朽的文字与作品。当前,科学发展观的倡行,对我们形成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反省机制与校正机制,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编辑作为文化正能量的关键环节,对于新时期民族价值观的科学建构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时代呼唤着大编辑的出现。

刘伟见

时代呼唤大编辑

遨游于文学和艺术之间

荣广润

知道毛时安的名字,是他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熟识毛时安其人,是他转到上海市文化局主持创作中心之后。

毛时安说:“我一生做过很多工作很多岗位,唯有写作贯穿了我的全部岁月。”这个自述由他最近出版的四卷文集作了佐证。他的文集并非是他几十年文艺论文的全部,但已是洋洋洒洒 100 余万字,而且其涉及的面甚广,文学、美术、戏剧、电影、文化政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工作经历,使他的文思得以遨游于文学和艺术天地之间。

毛时安是个率真热心的人。他对艺术家总是抱有热心帮助的态度,对许多文艺问题总是直率地发表见解。在文化部门工作的 10 余年间,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他担任主任的创作中心,集中了好几位著名的剧作家和导演,他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奔忙操劳,做了许多服务性的工作,哪怕有些人、有些事在圈内有异议,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扶助。在他文集的附录中,有他为赵耀民、罗怀臻、赵化南、瞿新华、黎中城、陈西汀等六位剧作家主编出版的剧作选和为陈薪伊主编出版的导演手记的书单,他为这些艺术家落实出版经费,为他们写序,详细地评述他们的艺术成就,其热情与周到很令人感动。10 余年间,上海大量文艺作品的创作都有毛时安和创作中心的介入,但他从来没有在这些作品的创作栏里署过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在学术不端之风日甚的今天尤其如此。

毛时安的率真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能看到。他的《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一文,直陈当前戏剧创作的不足。他说他在 7 年多时间里看了 1000 多次(场)戏,“不能不说对没有‘好看的戏’,但是真正让观众让我觉得‘好看’的戏,实在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这一看法与我们通常听到的谈文化必先说形势大好再略讲一些问题的腔调相比,是尖锐的,直率的,也是一针见血的。

相对而言,我对毛时安近 10 余年的文章,要更偏爱些。他到文化局以后的文章更多的是研究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工作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他观看了大量的文艺演出,阅读了大量的剧本,参与了许多作品的创作与修改的过程,参加组织了许多文艺的活动,接触了当前文艺工作面临的各种难题,因此其文章和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观点更为犀利、更具针对性。他自己也作了这样的总结:“我直到晚近才意识到,自己既非书斋中人,也非官场中人,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社会中人,在社会的风浪里摸爬滚打。”正是实际工作的摸爬滚打赋予了他的文章以新的活力。他的那篇《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文艺评论一等奖,而且是榜首,就是缘于他对当代戏剧创作的实际状况了解得深透,他所指出的戏剧创作缺血、缺血、缺想象的弊病,所分析出的戏剧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生态、文化环境的论断,确实是切中要害。这样的文字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是写不出来的。他的另外两篇文章,《营造上海文化大市场的若干思考》、《世纪之交:文化的选择与建树》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毛时安说:“写作是我的宿命。”30 年间,他的写作铸就了他的四卷文集。既是宿命,他的笔耕是不会停歇的。我们期待他拿出更多更精彩

